

社会简史 现代世界的诞生

A Short History of Society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英] 玛丽·伊万丝◎著
曹德骏 张荣建 徐永安◎译



社会简史：现代世界的诞生

[英] 玛丽·伊万丝 著

曹德骏 张荣建 徐永安 译

曹德骏 校

復旦大學 出版社

目 录

致谢	001
前言	001
第一章 现代的形成	001
第二章 理性、革命和反应	030
第三章 技术革命	059
第四章 众说纷纭的现代性	090
第五章 历史上发生的事件	120
注释与参考文献	150
索引	154

致 谢

谨向在本书撰写过程中帮助过我的人致以谢意。开放大学出版社的克里斯·卡德莫尔(Chris Cudmore)对我的初稿表示了赞赏,是给予本书最坚决支持和最大帮助的第一位读者。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维姬·霍尔(Vicky Hall)和吉玛·查普曼(Gemma Chapman)提供了宝贵的帮助,我的儿子汤姆(Tom)和吉米(Jamie)对现代世界的特征贡献了他们的意见,还对本书讨论的话题保持着盎然兴趣。

前 言

本书的封面再现的是西班牙艺术家委拉斯贵兹 (Velazquez, 1599—1660)^①在 1656 年创作的《宫廷侍女图》。这幅绘画的内容远非用任何语言可表述：它刻画了我们居住的这样一个世界：我们对多样性的承认，我们对自我的社会 and 个体存在的自我意识。但是，考虑到其完成的时间，这一绘画还刻画了不同时代的延续：我们可以在《宫廷侍女图》这幅画中发现我们自己，并且让我们明白，我们与 17 世纪的人们共享历史。本书就是以这种关系的重要性为前提的。

乔治·奥威尔 (George Orwell, 1903—1950)^②的小说《一九八四》涉及众多主题，包括高度受控的社会抹掉历史的某种方式。本书并不想争论我们的社会是有意识地屏蔽历史，屏蔽我们对过去

① 委拉斯贵兹是西班牙宫廷画师。他深受威尼斯画派的影响，反对追求外表的虚饰，主张真实地描写现实。善于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笔触自然、色彩明亮。代表作有《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纺织女》、《宫廷侍女图》等。——译注

② 乔治·奥威尔是英国人道主义者、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著名的英语文体作家。作品《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影响巨大，他以冷峻的笔调勾画出人类阴暗的未来。——译注

的集体记忆,无论这种情形出现与否都是另外讨论的话题。本书的余下章节描述的是,在各种语境中,历史以编年史的方式给出的教训以及对各种观点和事件的背景的重要性的认同看上去都已消失。有人说,我们生活在新的“危险”的社会(乌尔里克·贝克[Ulrich Beck])^①,人类和人类的相互关系以及人类自身已经与从前完全不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②、布赖恩·特纳[Bryan Turner]^③和唐纳·哈拉维[Donna Haraway])^④¹。他们以及很多其他学者,提供了对21世纪的解释,这些解释强调了与从前的历史时期的差异。本书不准备讨论这些话题,而是描绘这些明显变化的事件发生之前的世界,同时希望解释观点和背景的关系,以及过去与现实的关系。因此,在读者阅读本书前,首先需要理清一些问题。

首先,本书假设“社会”的存在。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的名言称“社会”是不存在的。许多社会学家

① 乌尔里克·贝克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慕尼黑大学教授。长期从事社会发展和全球化问题研究,提出风险社会、第二次现代化等产生广泛影响的理论。主要代表作有《什么是全球化》、《风险社会》、《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世界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理论修正》、《自由之子》、《反思性现代化》、《全球化的政治》和《世界社会的前景》等。——译注

② 安东尼·吉登斯为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现在剑桥大学任教。他以结构理论(theory of structuration)与当代社会的本体论(holistic view)而闻名,被认为是当代社会学领域中有卓越贡献的学者之一。他写了至少34本著作,被译为29种语言发行,并且以平均一年一本以上的速度写作,学术贡献巨大,被认为是自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来最有名的社会科学学者。——译注

③ 布赖恩·特纳是著名社会学家,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译注

④ 唐纳·哈拉维是当代西方著名的跨学科学者。她提出了著名的赛博格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科学观,还对基因食品进行了文化解读,建构了“处境知识”(situated knowledge)等概念。——译注

(如约翰·尤里[John Urry]^①)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认为在一个全球世界中,我们不是生活在相互独立的社会里,而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²。这种观点(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苏联随之解体后的世界里)确实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但是,本书作者认为,我们应该抵制这种观点,原因有两个:首先,我们当前居住的社会世界是我们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需要理解这种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其次,以为“历史”在苏联解体后就已结束了的观点,就连其主要的鼓吹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1955—)^{②3}也放弃了。显然,当今社会无处不在的不同文化之间与不同社会之间的冲突,例如社会世界中宗教的恰当位置,就是历史留下的遗产之一。历史学家彼得·拉斯莱特曾经写道“我们已经失去了各种世界”(Peter Laslett, 1915—2001)^③,但是,另一位历史学家帕特里克·科林森(Patrick Collinson)则认为,我们具有重新获取、理解和认识这些世界的能力⁴。

另外一系列需要理清的问题包括“现代”、“现代性”和“现代主义”这些术语。这些术语常被当作同义词互换使用。事实上,它们的意义截然不同。从历史的角度看,“现代”一词表示的是经常变化的节期(在第一章中讨论)。然而我却用它来表示1500年之

① 约翰·尤里是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他的旅游观光研究的论著特别丰富,如《消费场所》、《观光的各种文化》、《观光流动性》、《展演观光场所》等。——译注

② 弗朗西斯·福山是日裔美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兰德公司(RAND Corp.)社会学顾问及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重要幕僚,现任弗吉尼亚州乔治曼森(George Mason)大学公共政策系教授。主要著作有《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后人类未来——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跨越断层——人性与社会秩序重建》、《信任》等。——译注

③ 彼得·拉斯莱特是美国著名学者,其研究对政治思想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剑桥学派”影响至深。——译注

后的时代。在这些年代里，宗教改革的结果是欧洲出现了基督教的新教派——新教。新教的影响程度存在争论和不同意见，但是无人否认其重要性以及在很多方面产生的持续影响。第二个术语是“现代性”，在这儿与在很多语境中同样，它表示 19 世纪中期欧洲出现的对世界的理解和体验的形式。“现代性”可以部分地通过该历史时期对于变化的认识来定义，也可以部分地通过随同变化而来的人类的可能性的新认识来定义，因而“现代性”表示的是对特定的社会文化世界的认识和理解。第三个术语是“现代主义”，在此代表的是 19 世纪后期到 20 世纪初期的艺术运动。

本书关注的焦点是英国，但是，我们现在知道，描述英国不止是对一种文化和一个地域的描述。女权主义、性别政治、“后殖民主义”和“特称研究”的思想，以及像保罗·吉尔罗伊 (Paul Gilroy)^①这些学者，都使书写历史成为比从前更具有多样性和更流行的领域⁵。所以，尽管本书关注的焦点是英国，但是，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国家的范畴理所当然地不封闭来自其他地域的观点。读者需要注意的另一点是，资本主义与工业化不是同义词，资本主义作为市场和利润动机的政治经济学说，早在工业化之前就存在，两者的存在并不相互依赖。1989 年后，市场经济是组织社会的唯一方式的观点大行其道，还鼓吹将其“自然化”(naturalize) (在这些年代中，与民主、市场经济是“自然的”相关的观点同样风靡一时)。但是，只消回顾一下过去 500 年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些观点

^① 保罗·吉尔罗伊是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社会学教授。他对“种族”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在当今西方乃至世界文化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译注

都是错的。民主现在(也包括过去)必须通过斗争才能获得,而且还需要加以保护。如果说历史给予了我们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人类事务中没有任何一点是“自然的”。最后一句话,作为对过去500年的简要叙述,本书不可避免地会省略掉众多“创造了”历史的重要事件和人物。我真诚地希望读者能够在回顾他们过去历史的形成中发现更多的新东西。

第 | 一 | 章

现代的形成

- 1314 年 但丁的《神曲》出版
- 1492 年 西班牙费迪南和伊莎贝拉对格林纳达城的“光复”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到达西印度群岛
- 1501 年 米开朗琪罗完成了雕像《大卫》
- 1517 年 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95 *Theses*) 在威丁堡公
开贴出
- 1547 年 特伦会议成为反宗教改革的开端
- 1564 年 莎士比亚出生
- 1605 年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第一卷出版
- 1633 年 伽利略被迫放弃哥白尼的学说

在某些人类史学者看来，本书中首先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欧洲，在某些重要方面，完全可以看作是“现代”的。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将会发现，回溯 1500 年时的欧洲对我们拥有 21 世纪的期望和情感的人来说是巨大的震惊。当时也有城镇（如果我们现在居住在这些老式欧洲城镇中，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识别出这些过去都市的痕迹）。但是，假使我们遇到当时的人们，或者，我们自己就是 16 世纪的公民，他们会在许多方面与我们的现代自我大相径庭。那时我们大多数人的寿命不会超过 50 岁；大多数人会相信天主教关于世界起源的解释；对自己的生存和繁衍很少有或者没有支配能力；完全可能成为文盲并且受到饥饿的威胁。当然，我们会无休止地为了食物和住所担忧，我们会明白，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年老体弱迫使我们依赖家庭和教会的施舍。尽管好莱坞影片不遗余力地将中世纪描绘为色彩斑斓的舒适世界，但是，事实却不是那样。哪怕确实建造了美丽的建筑，确实创造了奇迹般的手工艺品，15 世纪生活的普遍经历只会是朝不保夕和变化莫测。

这个世界是否是“现代”的问题可以争论。有的历史学家认为,现代世界是从1789年的法国革命开始的,另外的历史学家则指出,现代欧洲开始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还有的历史学家表示,所谓的“现代”是在20世纪才出现的。在15世纪末期,很多日子被认为是“现代”的开始。例如,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首次航行到达新大陆,1501年,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 1475—1564)完成了雕像《大卫》。1485年,英国的“玫瑰战争”结束。所有这些日子都被看作是“现代”的开始,因为它们标志着社会世界新的转向。对“现代”的另外一种解读是,其实从14世纪而非16世纪起,欧洲就出现了具有“现代”思维方式和理解世界方式的某些特征。确实,到1500年,因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到达西印度群岛,或者按照习惯说法,因为“发现了新大陆”,欧洲与世界各地的联系得以扩大。当时,首部旅行书籍已经出版了(作者是伊本·拔图塔[Ibn Battutah]^①,1304年出生在丹杰尔,1356年编成的《游记》出版)。该书表明,相距遥远的不同文化的接触早已存在,比那些广为人知的所谓16和17世纪的“考察探险年代”早得多。伊本·拔图塔的世界丰富多彩,这是由贸易和伊斯兰教联系的世界,从孟加拉延伸到北非,从东非连接到了喜马拉雅以南地区。马可·波罗(Marco Polo)被称作是第一位伟大的欧洲航海家,但是,尽管伊本·拔图塔是在马可·波

^① 伊本·拔图塔是著名阿拉伯旅行家。1346年,他以印度苏丹使者的身份来到中国的泉州、广州、杭州等地游览。回国后,由他口述,穆罕默德·伊本·米赞·凯洛比笔录,于1356年编成《游记》,又名《异域奇游胜览》。——译注

罗去世后才开始航海，却是一位更加勤奋的航海家。相对于那些从来没有走出自己村庄以外的成千上万的人来说，这些航行，如果为人所知的話，仅仅被看作是遥远世界的传说。14世纪伟大的航海家对航行作了记载，但是，面对14世纪大多数是文盲的欧洲人，他们的记载无非是传统口述故事的一部分。尽管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但在欧洲的大多数人眼中，他们了解的世界不会超过当地的范围。

14世纪这些航海家的航行被用来作为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14世纪完全可能是“现代”开始的时期。历史分期通常是复杂的，难以令人满意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对个人经历具有重要性的认识作为现代的一个特征，那么，14世纪的欧洲确实有很多例子表明，我们在14世纪确实看到了我们“现代”自我的出现。不过，这一判断方法是将文化置于医学、科学和技术之上的：我们可以发现，出现了对可以识别的“普通”人类的描述（乔叟[Geoffrey Chaucer, 1343—1400]^①与但丁[Alighieri Dante, 1265—1321]^②的作品都发表在14世纪），可以看到对宗教民主和政治民主的吁求（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 1330—1384]^③的追随者罗拉德教派[Lollards]），可以发现很多欧洲名牌大学的建立（在葡萄牙的科英

① 乔叟是英国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他的文学创作深受法国文学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学的影响，在英国文学和语言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主要作品有《公爵夫人之书》、《声誉之堂》、《百鸟议会》以及他的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等。——译注

② 但丁是意大利诗人，现代意大利语的奠基者，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开拓人物之一，以长诗《神曲》留名后世。——译注

③ 约翰·威克利夫时任牛津大学神学院教授，被认为是英格兰宗教改革和清教徒的先驱。——译注

布拉,法国的巴黎,英国的剑桥和牛津,意大利的博洛尼亚),还可以发现对人类状况的人文乐观主义。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世界,它仍然受到自然的蹂躏和需求的制约。1348—1349年期间的黑死病(Black Death)夺去了欧洲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的性命,成千上万人的命运系于收成的好坏。14世纪的“现代”人或许会环游世界,并且写下对人类情感永恒的同情,但是,他们同样受困于与自然世界的危险关系中。在其他方面,特别是在基督教联盟中,他们的世界并非与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世界一样。所以,尽管14世纪的世界有众多我们所熟悉的东西,本书还是得从16世纪初期谈起。

上述引言如同本书正文一样,与英国社会史相关,是与该社会和其他社会变化的轨迹有关,也与这些社会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有关。但是,也如同引言所示,本书正文并不把英国或者欧洲看作封闭的或者如同城堡般戒备森严的地理和文化孤岛,对其他文化一无所知。人类的好奇心和人类的贪婪总是使文化与社会以这样的方式混杂,既不会是带有彻头彻尾的侵略性关系,也不会是完全爱好和平的关系。到16世纪末的欧洲历史表明,前一种关系占支配地位:很多历史叙述都会谈到诺曼“征服”,北欧海盗“入侵”和“玫瑰战争”。但是,在15世纪末期,从这些军事行动中诞生了欧洲公认的民族国家,如法国、葡萄牙、匈牙利、波兰、西班牙(在阿拉贡国王斐迪南[Ferdinand of Aragon]和卡斯蒂尼亚女王伊莎贝拉[Isabella of Castile]结婚之后)以及英格兰获得了与现代疆域相似的区域。其他的欧洲社会以独立的城邦(意大利)或者是公国

(意大利和德国)的形式而存在,由共同的语言作为联结纽带。在宗教改革之前,比语言纽带更有力量的是,整个欧洲对天主教一致忠诚,这种忠诚建立在两个基本信念上:信仰弥撒和信仰教皇至高无上的宗教地位。如果教皇至高无上的宗教地位受到挑战(出现两个或者有时出现三个教皇,如1378—1449年的宗教分立),信仰弥撒就成为欧洲主要的联结纽带,并且在16世纪成为欧洲分裂的主要原因。

“弥撒”一词指的是基督教堂举行的主要信仰活动,它源自耶稣·基督在被钉上十字架前的最后晚餐的描绘。弥撒,也称圣餐,是基督教对信仰上帝和世界关系的简要描述。面包和红酒本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通过圣餐变体之道,在弥撒中成为耶稣·基督的肉体和血液。信仰通过参与日常宗教活动而创造了永恒的生命,并且使信仰者相信来世。这种信仰给予生活在14和15世纪的许多人灌输了上述观点,这是基督教对人们具有吸引力的部分原因,这些人们在尘世的人生非常短暂。不过,基督教不仅仅是安慰生活在艰辛困苦中的人们的宗教,它既是针对其他宗教的极端暴力行为的一种激励(在英格兰,就是爱德华一世将犹太人从某些国家驱逐),也是对作为欧洲亮丽风景线的哥特式艺术和建筑珍宝的灵感。另外,人们普遍认为,在欧洲,根据日落而息而调节的工作方式终止于工厂的建立和工业革命的开始。不过,生活在13或14世纪班尼迪克修道院或西斯特修道院的修士们会认为这种观点荒唐可笑,因为这些寺院早就有了自己工作、睡眠和祈祷的固定模式。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①对于这些寺院的模式是这样评论的：它们中间蕴藏了16世纪伟大的技术和智力发展的种子。

16世纪之前的欧洲可能比历史任何时候都要团结和睦,而这种和睦后面的文化力量就是基督教的力量。当时的欧洲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农业社会的共同经验:大多数人在土地上生活和劳作,他们很少离开土地,对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都市生活一无所知。14世纪作为欧洲历史转折期的重要性就在于,封建制度在黑死病(Black Death)之后的消亡和我们今天所称的雇佣劳工的出现。奴隶和农奴肯定还在欧洲某些地方残留着,但是,在16世纪的欧洲,大多数人已经具有现代经历:通过出卖劳动力谋生,而不是作为农奴为封建领主无偿劳动。这一社会关系的转换是现代社会出现的重要条件:这种转换承认权力的社会分配,法律的意义,以及带有社会权利与社会责任的形式上自由公民意识的最终出现。不过,一种还要延续几个世纪的现实是,男性被认为是人类的确定形式,按照《圣经》的记载,女性是“亚当的肋骨”,她们既比男性卑微,也要对男性在伊甸园的堕落负责。不过,欧洲社会没有强制实行严格的性别隔离制度,或者拒绝女性参与政治和文化生活,只要她们足够富有或者有足够的决心。宗教改革之前,女性君主、宗教组织的女性和许多匿名的女性在影响欧洲社会的重大事件和文化中起了重要作用¹。

① 马克斯·韦伯是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现代思想家之一,被公认为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其主要论著包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政治论文集》,《学术理论论文集》,《社会史与经济史论文集》,《社会学和社会政策论文集》,《经济与社会》。——译注

15 世纪初期出现了技术革命，它加速了宗教在欧洲的霸权地位的动摇，使得欧洲百姓朝民主和公民地位的观念迈了一大步。这一革命就是印刷术的引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活字印刷术的引进。研究 15 和 16 世纪的历史学家都认为，用迪尔梅德·麦克卡洛克(Diarmaid MacCulloch)^①的话说，“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宗教”²。在麦克卡洛克和其他历史学家看来，《圣经》的普及促成了宗教改革，如果这还不够的话，印刷术的影响改变了欧洲人关于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思维的独创性的思想。13 和 14 世纪修道院中忙碌但组织良好的修士们或许会认为，“文字”是逐字逐句的，直到印刷术的出现，“文字”才开始具有我们对该术语的现代意义上的理解，即“文字”包括与宗教典籍的缮写同样的创造过程。印刷术一旦出现，思想就不会再被那些能够购买和收藏昂贵手抄稿的少数人所“独占”了。任何思想和文本，如同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②在四百年后所说“都可以进行技术上的复制”³。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在印刷术出现之前，就存在不同思想了，尽管是通过手稿和口头传播的。

印刷术的出现有时被看作是现代世界的首次民主革命。这种观点突出了印刷术本身具有的对权威的挑战：任何压抑民众的政权都清楚，文字非同小可，一种能够让具有潜在危险的思想传播的技术并非总是受到欢迎。到 16 世纪末期，肯定有很多欧洲王室成

① 迪尔梅德·麦克卡洛克(1951—)，现任牛津大学教会史教授。——译注

② 沃尔特·本雅明是德国文艺评论家，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在文艺评论方面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在社会上获得颇高声望。主要著作有《德国悲剧的起源》、《波德莱尔研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论历史哲学》等。——译注